

我国货币政策

杨培新 著

我国货币政策

杨培新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庄 凌

我国货币政策

WO GUO HUOBI ZHENGCE

杨培新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04,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书号4002·319 定价0.93元

序 言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在中国大地上正以排山倒海、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其气势雄伟和曲折旋回则有如万里长江。长江汇集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形成浩瀚的江流，长驱直下。但是越过万县以后，就要横切巫山，穿山越岭，经三峡、渡险滩而不屈不挠，辗转向前。渡过三峡以后，长江才能大江东去，直泻千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从1979年起，以农村包产到户、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了农民、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显示其神奇的威力，取得了国民经济调整的胜利。而从1983年重点建设开始以后，由于触及传统体制的根本，开始进入深入的改革阶段。经过这一段艰苦的细致的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更加光辉而美好的前景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本小册子收入的文章，既记录了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初战的胜利，又记录了其深入发展的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当时面临的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外汇逆差的严峻局面。1980年财政赤字127.5亿元，财政

向银行透支 118 亿元，银行增发票子 79 亿元，银行外汇储备枯竭，物价上涨 6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 1981 年开始进一步调整。1962 年开始的调整，经历了三年的时间才告完成。而这次调整，却仅仅经过一年半时间，1982 年就出现了买方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买方市场，这是破天荒的创举。收入本书的 1982 年 8 月写的《1982 年市场和货币流通状况的变化》一文，描绘了这个新鲜事物的出现，从事实和数字论证这是我国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人民积极性所取得的胜利，是金融体制改革、银行对轻纺工业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外汇贷款、技术改造贷款的胜利，是在发展战略上走中国自己道路、让人民得到实惠的方针的胜利。这次克服通货膨胀威胁，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三个方面都采取了全新的措施。这一段实践证明，只有改革才能加速调整，只有改革才能消除通货膨胀威胁。当前重温这段历史经验，探索其规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982 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1983 年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进入了建设阶段。我国历来的习惯是：调整时期用中国自己创造的办法，建设时期就袭用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在基本建设、财政、金融领域依然拥有深切的影响。

苏联模式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经济发展目标和发

展战略上,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追求高速度的方针。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希特勒叫嚣进攻苏联,它不能不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方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更由扩军备战转入战时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美进行军备竞赛,苏联很难摆脱备战经济乃至战时经济的窠臼。备战经济必然强行追求高速度,或者以钢铁产量翻番为目标,或者以产值倍增为目标,而不可能以经济效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标的。二、宏观经济上必然出现庞大预算、财政赤字、信用膨胀、通货膨胀、商品供不应求等现象。苏联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从1928年到1936年),货币流通量由18亿卢布增至102亿卢布,增长4.6倍,而消费品从1928年到1940年仅增长1.3倍(其中,棉布增21%,毛织品增15%,粮食增25%,蔬菜增40%,砂糖增53%,畜产品减10%)。因此,1932年到1935年、1939年到1940年发生两次物价大上涨。三、建立统制经济体制。由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又不能放任物价上涨,就求助于统制经济,冻结物价,限制市场的作用。运用行政力量,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统制。1932年配给制扩大到所有城市,包括面包、肉类、鱼类以及棉布等工业品。生产资料供不应求,只得由行政机关实行计划分配,并进行物资调拨。消费品配给制,生产资料由政府分配和调拨,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直接见面,出现了消费品的统购统销,物资的统一调拨。越是商品供不应求,就越不可能进行个别商品的价格调整,以免牵一发

而动全身。价格不合理,有些企业长期发生亏损,企业经济核算制名存实亡。由财政部门实行利润全部上交、亏损由国家弥补、全国共吃一口大锅饭的财政统收统支体制。由于劳动力紧张,对劳动力也实行统一调配。这种由计委统一下达产供销指标,商业部门统购统销,物资部门统收统配,外贸部门统进统出,财政部门统收统支,银行部门统存统放,劳动部门统包统配的统制经济体制,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僵化,窒息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产者不知道消费者的需求,不受消费者的监督,产品由商业、物资、外贸部门包购,这就助长了货不对路,质量降低,盲目生产,大量积压。事物被颠倒过来,生产什么销售什么,销售什么消费什么。四、为了掌握粮食和物资,要求所有制加速过渡。农村加速农业集体化。统制经济对商品生产起了窒息的作用,它只能在战争年代用以维持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但绝不可能带来富裕和繁荣。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结束后迅速停止统制经济。日本从1950年、西德从1948年开始停止通货膨胀,废止统制经济,重新发挥市场的作用,从而取得国民经济较高速度的发展。苏联由于坚持备战的目标,它既不可能改变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也就无从调整宏观经济,并改变统制经济体系。

我国1983年转入建设以后,在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转轨方面还来不及对传统模式进行系统批判和改革的情况下,出现了复杂的形势。调整时期赵紫阳同志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

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个提法是较为全面的。但是我们长期习惯于追求产值、产品的翻番。有些地区、有些部门就滋生了片面追求产值提前翻两番、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投资膨胀，使1983年货币发行达90余亿元，几乎突破三位数。为了摸索建设时期的货币流通的新变化，我经过调查写了《重点建设开始以后的货币流通形势》，认为基本建设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建议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彻底抛弃苏联模式，走出一条新路子，否则必然带来货币大投放；认为当前银行一根扁担挑了两筐鸡蛋，一头是支援重点建设，一头是货币稳定，哪筐鸡蛋都不能砸。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成立中央银行的建议，指出银行是今后宏观经济调节的主要机构。

由于在发展战略上出现追求高速增长、轻视经济效益而注重产值翻番的偏向，由于扩大再生产中抓基本建设、忽视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由于基本建设中苏联模式的资金供给制、由行政机关集中进行投资决策的体制没有进行改革，带来了国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破坏了我国的宏观经济平衡，出现了投资失控、消费基金失控、银行贷款失控、货币发行失控、外汇使用失控、外汇储备耗损等现象。这种情况下，怎样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控制，同时把微观经济搞活，成为重要的问题。1985年5月的珠江三角洲之行，基层领导同志和工厂厂长的分析和要求，对我有很大启发。回来后，我

写了《论“紧中有活”方针》的文章，认为紧缩是必要的，但必须同时搞活金融，搞活外汇，搞活经济。1985年7月香港之行摸清楚世界各国资金、特别是东南亚资金云集香港，期待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写出了《对东南亚资金云集香港的考察》一文，认为我们引进外资中决不能叶公好龙，真正龙来了，却逃之夭夭。1985年10月的深圳之行，认为深圳的外汇调剂方案是切实可行的，写出《保护深圳这个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1986年春各地企业流动资金告紧，影响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怎样解决当前的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着重分析了1985年抽紧银根中压缩流动资金供应，而没有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缺点，实质上起了扩大缺口的作用，出路只能是压缩基建投资，以保证流动资金需要。

《我国当前应当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写于1985年9月，这是从1984年底到1985年9月几次实地调查和反复思考后得出来的结论。文章认为首先要肯定1979年到1982年消除通货膨胀威胁所取得的宝贵的成功的经验，从这里出发，研究中国今后应当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认为投资失控的根子在苏联模式的基本建设体制，其根本特点是资金无偿供给制和投资决策的高度集中于行政机关，这就必然陷入投资效益低、投资饥饿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这又和我国财政、金融体制实行苏联模式下的大锅饭体制密切相关。认为1985年抽紧银根是必要的，但存在“一刀切”和“急刹车”甚至“急倒车”的缺陷，建议既要控制宏观，又要搞活微观。改革财政金融体制的实

质是废除苏联模式的基本建设体制和资金供给制，消灭财政赤字和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制，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扩大银行基层机构的经营自主权，从而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比例关系。赵紫阳同志 1986 年 1 月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当前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不要一刀切，而要区别对待，既控制需求又增加供给，不该贷的贷了是错误，该贷的不贷也是错误；同时指出金融体制改革，要围绕增加储蓄，改进服务，提高资金效益来进行。这篇讲话，为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开展金融体制改革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举国上下一致关心的问题。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重视宏观经济调节，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在这以后，经济学界就金融体制改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报告，指出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资金市场，更促进了讨论的深入。1984 年 12 月我经过调查，写出《关于当前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提出要抓两个环节：一是加强银行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认为这方面不能照抄西方的三项措施，而应适应中国国情实行简单明了的控制方法，这就是中央银行要控制好对专业银行的拆款（或再贷款），而不必采用苏联的信贷计划办法，以免妨碍专业银行多吸收存款、搞活对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二是专业银行基层机构要实行企业经营，允许它多存多贷，多收多支，以调动其积极性，使之有动力、有活

力、有压力。认为搞活银行基层机构,不但不会削弱宏观经济调节,而且会把宏观经济调节任务落实到基层,既把国民经济搞活,又有效缩小信贷收支差额和货币发行。

198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我作了《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资金市场的问题》的发言,认为根本之点是废止按行政方式进行资金分配的体制,而要按市场原则组织资金供应,建成多成份、多形式、多渠道的资金市场。要有国家的、集体的、侨资的、外资的、中外合资的多种金融机构。允许采取发行股票、公司债、向银行举借中长期贷款、举借外债等多种渠道的资金融通方式。提出要抓如下几个环节:一是扩大专业银行基层机构的自主权,二是以建设银行为中心建立固定资金市场,三是引导社会集资,逐步形成长期资金市场,四是引进海外资金,加速经济发展。对社会集资问题,在经团联和金融学会召开的讨论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对社会主义企业家怎样顺应时势,学会运用各种资金,1984年4月在国家经委举办的青年厂长研究班上作了《社会主义企业家要善于运用集资、贷款和外资》的报告。

1985年7月香港华商银行公会和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发起召开“中国的金融制度及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机会”的研讨会,邀约我就《中国金融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发言。我从说明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入手,分析已经发生的变化和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个发言从资金供应渠道的变化分析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进而预测中国金融事业今后的发展趋

势。由于这是香港公众关心的问题，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财经日报》《南华早报》等都作了报道，《东方日报》、《国际贸易》等全文刊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里程碑。这几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现在正在进入深入工作的阶段。我们深信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指引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会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成绩。我希望这本小册子，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促进讨论的作用。

作者 于 1986 年

目 录

序言	1
我国当前应当采取怎样的 货币政策	1
怎样解决当前的流动资金 不足问题	20
1982 年市场和货币流通状 况的变化	29
重点建设开始以后的货币 流通形势	42
论“紧中有活”方针	57
保护深圳这个对外开放政 策的窗口	64
对东南亚资金云集香港的 考察	70
关于当前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77
中国金融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90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回顾 与展望	100
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资 金市场的问题	114
论开展社会集资	126
社会主义企业家要学会运用 集资、贷款和外资	134
特区货币有关的一些理论 问题	144
论中国银行在 外汇增收节 支中的作用	158

我国当前应当 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遭遇了两次通货膨胀的威胁。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2年，由于我们实行了正确的货币政策，到1982年下半年就顺利地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威胁。第二次是1983年、1984年到现在，重点建设开始，集镇企业发展，消费基金剧增，带来了银行贷款、货币发行和外汇使用的失控，使我们再一次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成为中外瞩目的重要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要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1979年到1982年胜利消除通货膨胀威胁的极其宝贵的成功的经验，然后认真分析这次宏观经济、货币流通中出现的问题，就能进一步明确今后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第一个问题：1979年到1982年，我们怎样胜利地消除通货膨胀，实行了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1979年、1980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1、“四人帮”统治时期，已经发生了长达十数

年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消费品供不应求,凭票凭证供应的范围扩大到近 100 种商品,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2、1978 年的“洋冒进”,引进 22 项成套设备,增加了基建投资和外汇支出,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外汇收支逆差。3、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我们不能不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这就引起银行农村票子投放的成倍增加,商业亏损报销以后就转成为财政赤字。财政赤字 1979 年 170 亿元,1980 年 127.5 亿元;财政向银行透支 1979 年 111 亿元,1980 年 118.7 亿元;银行增发票子 1979 年 55 亿元,1980 年 79 亿元;银行外汇储备出现负数;物价上涨率 1980 年达到 6 %。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当时采取了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总是和宏观经济中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商品供不应求相联系的。可以采取的办法,不外乎是抑制货币需求,或者增加商品供应。社会主义国家通常总是从抑制需求方面作文章。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长期存在隐蔽性的通货膨胀。1955 年马林可夫曾经尝试走发展轻工业、增加消费品供应的道路。但是由于苏联农业中的大锅饭体制窒息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一蹶不振,既不能保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更不能充分供应棉花、糖料、油料等轻工业所需的原料,轻工业也就不可能搞上去。苏联只得舍本求末,加强“卢布监督”。要求银行在各单位提取现金时多方卡住,以减少现金支付。例如规定企业现金收入要全部送交银行,不能用以支付工资,不准“坐支”;规定单位现金库

存限额、随时派人查库；要求银行搞工资基金监督，在柜台上卡住工资现金支付，等等。这种作法非常繁琐，既增加了银行的工作量，使银行处于和企业对立的地位，又无补于大局。我们中国在这方面有所创新，在抑制需求方面，曾经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战略性的措施。1950年3月我们“六路出兵”，从财政压缩开支，催收公债、税收，商业大量抛出货、暂停收购，银行优利吸收存款、停止放款，以回笼货币。在两个月时间内，把货币流通量压缩三分之一。货币流通量、货币购买力的大紧缩，带来了商品滞销和跌价，部分工商业倒闭，从而终止了通货膨胀局面。1962年我们关停数十万个企业，动员两千万工人下乡，使工资现金支出锐减；同时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回笼货币。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回笼货币三分之一。我国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坚持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的“三平”理论，这是一个宝贵的收获。只是由于当时“闭关锁国”的历史条件，“三平”还没有包括外汇收支平衡这个重要方面在内。这个理论反映了我们主要从抑制需求方面努力：财政收支平衡是要求不发生财政赤字，不搞国民收入超分配，不额外增加总需求。银行信贷收支平衡是要求不因信贷收支差额、额外扩大货币发行，不搞国民收入超分配，不额外增加总需求。物资供求平衡要求商业做好物资供应和调运，打击投机倒把。因此“三平”理论主要是从抑制需求方面作出文章，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了很好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制止通货膨